

百年後的重現：美國大學校園上演洪深劇作



(本報綜合報導)11月16、17日兩天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羅伊·博文劇場上演了百年話劇《為之有室》(The Wedded Husband)。本劇由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劉思遠教授任導演，俄州大東亞系博士生何曼擔任製作人。

早在1919年4月，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堂，一部講述中國故事的話劇震動了1300位觀眾。這是他們第一次欣賞到來自遙遠東方話劇。編劇、導演並參與演出這部劇的是一位二十五歲的中國留學生——日後成為中國現代話劇和電影的奠基人之一的洪深。近一百年後，為

紀念洪深，這部劇作《為之有室》(The Wedded Husband)再次搬上了洪深的母校俄亥俄州立大學。

《為之有室》以民國初期的天津為背景，講述包辦婚姻制度下愛情、忠貞與生死的複雜糾葛。這是已知最早的中國人以英文創作的多幕話劇。

此次重新排演沿用洪深以英文創作的劇本，並像當年一樣，由中美學生演員合作演出。洪深於1919年《為之有室》的排演中便採用了男女、異族合演的方式，這在當時的中國和西方戲劇界都是一個大膽的創新之舉。劇本方面，《為之有室》融合了晚清民初短篇小說、文明戲、改良京劇，以及西方戲劇創作理論等因素，完好地呈現了20世紀初中國劇人在世界舞臺上創作中國式戲劇的實踐與努力。

1916年至1919年期間，洪深作為中國公派留學生在俄亥俄州立大學陶器工藝系學習。期間他以英文創作了《為之有室》及《東方明兮》(Rainbow)兩部劇作，其中《為之有室》在校

園上演並大獲成功。此後他轉入哈佛大學學習戲劇，並於1922年歸國，投身藝術事業。在話劇排演上，他將男女同台演出的概念和立體舞臺背景引入中國，並創立了正規的導演制度。此外，他也對中國戲劇理論和電影有卓越貢獻。

今天，隨著中美文化交流日益廣泛深入，《為之有室》在俄亥俄州立大學的重新排演，不但強調洪深及其早期戲劇活動的歷史文化意義，更是為建立全球視野下的文化中國提供新的視角與平台。

《為之有室》的上演經過一年多的籌備，是俄亥俄州立大學系列洪深紀念活動的重頭戲。另外，洪深編劇的電影《新舊上海》將配英文字幕於美國各地學者參與的“洪深與民國時期中國媒體空間”學術研討會召開期間播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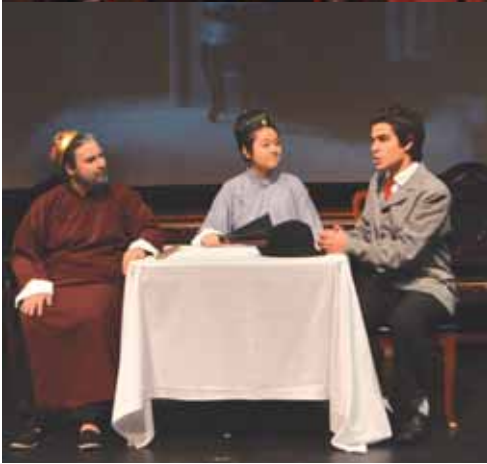
洪深紀念系列活動由俄亥俄州立大學文理學院、東亞語言與文學系、東亞研究中心、中國研究中心、戲劇系、中國語言學研究生會及東亞系研究生會等聯合推出。該大學中國研究專家鄧騰克(Kirk Denton)和夏頌(Patricia Sieber)擔任顧問教授。

俄亥俄州立大學位於美國俄亥俄州首府哥倫布市，是全美最大的公立大學之一，學生總數六萬餘人，其中留學生佔十分之一。該校有中文藏書近二十萬冊，其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是美國漢學研究重鎮，有十餘位中國研究和教學專家。

當日本報記者採訪了前來觀看話劇中國的留學生，他們表示很有意思，尤其對中國傳統

不那么瞭解的現代學生不可思議，為什麼相愛的人不能結婚，為什麼沒有愛情父母包辦的婚姻可以成立，既然從來沒有愛過的丈夫已經死了，為什麼不和自己相愛的人結婚。現在與過去時代不同，人的思想不同，傳統不同。

擔任製作《為之有室》的俄州大東亞系博士生何曼表示：上演這部話劇的演員他們都很努力用工把這部作品再次搬上舞臺，這是弘揚與發揚中華傳統文化，她感謝所有支持並能將這個話劇搬上舞臺，她也感謝加拿大的導演，她表示她們一起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。



何採菊從杭州與蒲瑛從上海她們是在1991年9月6日同一架飛機一起來克里夫蘭，又是一個巧合她們又不約而同一起觀看了《為之有室》，演出後與製作人何曼合影。



現場採訪的來自中國的留學生

苦味人生不自哀——寫在父親洪深去世五十五周年之際

作者：洪鈐

一九五五年八月，身患肺癌病危中的父親還能夠清楚說話時，對守護在旁的母親說：“我不想死，我還要活五十年，我要看到黃河水清的那一天！”父親用這種“誇張”的語言，表達了自己強烈的求生願望。可是，沒有走出這個八月，父親就去世了；五十多年已經過去，黃河水沒有變清澈。

願望，只是願望。這個世界上，沒有誰能夠真正預言未來，沒有誰可以完全真正控制人類社會。就是對自己的生活，也沒有誰能做到完全真正掌握和控制。這應該是一個普通的道理，甚至是一種科學的常識。但我，是在不斷的生命實踐中，對此才一點點地有所知和有所悟。正是有了這種基本的觀念，我感到自己才可能去解讀父親六十年的生命歷程。

父親洪深，一八九四年(清光緒二十年)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於江蘇武進(今江蘇省常州市)，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北京病逝。

一九七九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《辭海》，列有父親條目，該條目下為：“洪深(一八九四——一九五五)戲劇家。字淺哉，江蘇常州人。早年留學美國，專攻戲劇。一九二二年回國後在上海從事戲劇活動，曾領導復旦劇社、戲劇協社，並參加了南國社，對中國現代話劇的形成和劇場藝術水平的提高有較大貢獻。後任電影編導，並長期擔任學校教育工作。先後創作《趙閻王》、《五奎橋》、《包得行》、《鷄鳴早看天》等劇本。一九二九年(筆者注：應為一九)上海放映美帝國主義侮辱中國人的影片《不怕死》時，他當場憤怒抗議，鼓舞了群眾的愛國熱情。抗日戰爭爆發後，領導上海救亡演劇二隊赴內地，後在武漢參加籌組抗敵演劇隊，積極推動了戲劇界的抗日救亡宣傳工作。解放後從事國際文化交流工作，作品有《洪深文集》四卷。”

《辭海》中父親的條目，可以看作是被中國大陸官方所認可的“蓋棺定論”。那麼，父親算是位“名人”啦——身後被收入《辭海》者，畢竟不多。父親自己說：“我自己，極願做一個學者，但決不是所謂名流。我的生存是靠自己的勞動——我今天的地位，甚或薄有微譽，都是我個人的心血、汗珠、努力得來的。”的確如此，父親不是依附“勢力”而造出來的“名人”，也不是依傍“勢位”被托起來的“名人”。



洪深于一九五〇年

今年是父親去世五十五周年。對於今天的社會和今天的人，父親是一個已經消失了的人，他的身影幾乎也不再見到。正如父親所言：“人總是要過去的，而事業——對人類的貢獻——是永生的。”歷史在時間流淌中悠悠長長，昨天的事情，固然有它不該被忽視的重要之處。然而對在世活着的人，今天的現狀和明天的發展更重要。我很早很早的時候，就不希望、甚至極不情願父親的“影子”還在當今社會“徘徊”。如此，不只因為父親是屬於“昨天”的人，也有自己的“自私”：我不願意、亦不忍心看到父親被“糟蹋”——父親嚴肅的人生遭到“戲說”、“誤說”，而實際被“醜化”了。而我在捍衛“實事求是”的努力時，又是那麼無力，毫無作用。

一九五五年，父親對兩個女兒以後工作志向，明確要求：“(你們)寧可當個二流的科學家，也絕不要做個一流的文學家。”聽父親說此話時，我不過一個少年，對父親態度的堅決和“警告”意思，我印象深刻，此生不忘。後來，我讀了工科，潛意識中，父親的“告誡”不無影響。但我沒有成為“二流科學家”，只是一個“不入流”的、普通的工程技術人員。

如今，要確定父親此話真正含意，已無可能。父親不會只是出于“科學救國”的簡單想法而言，父親大概是希望孩子們能避免帶有“天然”弱點的中國“文人”在大傳統背景下難以逃脫的“不幸命運”吧。

父親家族，是武進(今江蘇省常州市)的大族。從家系來說，父親是清朝文學家、經學家洪亮吉的第六世孫。我的祖父(洪述祖)人很聰慧，未出洋卻有不錯的外文能力，文才亦佳。但祖父不甘守家過普通人的平常生活——哪怕是“不愁衣食”的生活，祖父向往“仕途”之道，追求在官場發達。晚清時，祖父捐了個直隸候補道。民國建立後，一九一二年三月唐紹儀受袁世凱命組閣政府，祖父因與唐的交情而供職內務部。三個月後，唐辭去國務總理職，祖父則繼續留在了袁世凱政府中。同年九月，趙秉鈞擔任袁世凱政府國務總理，祖父很得其信任。一

九一三年，宋教仁被刺殺，祖父因此案牽連，于一九一九年四月遭極刑——死時很慘。祖父在軍閥混戰割據的政界供職，最終，他在強權齒輪的滾動中被碾得粉碎而消亡。這也是他咎由自取罷。

中國社會的仕途，從來就不是一條光明大道，但“仕途”之路在“官本位”的中國社會，其巨大的誘惑力是非中國人而不可真正懂得的！祖父“仕途”之路的悲殘結局，是他對權勢的貪欲而致，不值得“同情”。但是，祖父的殘痛之死，對父親、乃至對我，都是深刻“教訓”。

祖父是和我沒有任何聯繫的、一個遠去了的時代的人。可是，對於父親，祖父是生他、養他的父親，父親和祖父被割不斷的血絲緊密糾結在一起，父親“迴避”不了這個被社會視為“罪人”的父親。父親一生，始終被自己父親這個“罪”的緊箍咒無形地捆綁着，精神不能得到解脫。一九三二年，父親在《文學月報》一卷一期發表的《印象的自傳》一文中，沉痛地寫道：“我父親不幸的政治生命使我陡然感受人情的殘酷。我父親下獄之後，許多親戚朋友，尤其是我父親走運時常來親近的，立刻都拿出了猙獰的面目。一個不負責任無能為力的我，時時要被他們用作譏諷或詬罵的對象。而普通的人士呢，更是懷

才能真正知道中國社會反動的“血統論”的恐怖和巨大的殺傷力，即使躲過了“誅九族”的滅門之災，祖父的“死”，帶給父親的是揹負一生的“重枷”；在祖父“陰影”中，父親一生走得艱難，一生內心和精神都煎熬。從一九一九年四月祖父被處死，到一九五五年八月父親去世，父親始終在痛苦和無奈中承受着作為“罪人”兒子的現實。在陰冷的現實社會里，在世俗勢力的壓迫下，父親挺起了脊梁做人，父親比一般常人更加努力奮鬥，更加艱辛付出，為的是自己不被擊垮、不被打倒、也不被折斷。父親明白：惟有如此，才有可能在生命之路上一點點地向前走去。

父親要求孩子不要學習文科，但父親本人卻是從工科開始自己的學業，後來再轉學文科，並以文科完成自己最後學業。如此，父親有他“不得已而為之”的苦衷。可以高興的是，父親文科學業學有所成：父親在中國新文化、新文學開拓和發展中的努力和奉獻，以及他因此取得的成績，不容置疑。

一九一六年，父親從清華學堂畢業考取官費留學美國。開始，父親就讀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化工系，學習陶瓷製造專業。一九一九年春，父親的父親——我的爺爺——在國內被處極刑。祖父刑前遺言，要求父親：“不必因此廢學，畢業方回。”祖父對父親學業的關注和對父親的期望，父親是明白的。同年秋天，父親即申請轉學去報考哈佛大學。經過當年哈佛大學第“四九”科目三百報考生錄取第十一人的嚴格考試，父親被錄取，師從戲劇家 G.P.Baker (陪克)教授學習“戲劇編撰”。父親也成為了哈佛大學第“四九”科目第一個、也是唯一的一個中國學生。

父親在美國為什麼轉學學習戲劇，他有過一次明確“說明”。一九四二年，父親對同在四川《江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》執教的馬彥祥叔叔說：“我的那次家庭變故，給我的打擊實在太大了。從那個時候起，我就決定，第一，我這輩子絕不做官；第二，我絕不跟那些上層社會的人去打交道。我要暴露他們，鞭撻他們。

這樣我就只有學戲劇這一條路。這條路我在國內學校讀書時候就有了基礎的。”父親這次談話，大概是父親對自己轉學戲劇真正原因唯一的一次“坦言”。

接下頁



一九四二年秋四川江安洪深(坐左)、洪深妻子常青真(坐中)、馬彥祥(坐右)和國立戲劇專科學校學生合影。常青真懷中的幼兒是作者

疑你，鄙視你，隱隱地把你不齒人類，仿佛你做了人，吸一口天地間的空氣，也是你應當抱歉的事情。……但身受的我，卻從此深深地認識到了一個人處在不幸的環境中的痛苦。”

只有實際地生活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，